雷震：雪山顶转眼痛失数十名战友

九峰山烈士陵园，松柏苍翠。每年清明，雷立宪都会带着儿孙来这里祭扫父亲雷震和母亲李爱民。孙子在作文里写下太爷爷太奶奶的故事，研学时还专程去了娄山关。

9月14日，记者在武汉见到了雷震将军的女儿雷立宪。她今年72岁，在家里排行老七。

雷立宪拿给记者一份42页、共18章的雷震口述回忆录，里面记录着父亲的革命故事。



雷震将军夫妇和9个孩子的合影。 记者高文举 翻拍

不当连指导员，先当战士

1906年，雷震出生于湖北黄陂尹家冲湾的一个贫农家庭，家中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。据雷震口述回忆录记载，他父亲常年在汉口码头做苦力，母亲靠织花边、缝补、浆洗维持一家生计。

“父亲回忆，小时候家里终年靠野菜和大麦糊充饥。”雷立宪说。雷震仅一岁半的弟弟饿死在母亲怀里。

雷震8岁那年，母亲因常年劳累病故。他被大伯收留，每天放牛、砍柴。10岁后，他又跟着四叔，到离村子十几里远的地主庄园种庄田。冬天赤脚下田，他脚上的冻疮一道道裂开，疼得钻心。

长大后，雷震在染坊、裁缝铺当过学徒，出师后找不到稳定活计，只能四处流浪。

1929年春节前后，雷震听说“跟着共产党就有饭吃”，便决定回乡寻找共产党。“那个时候我父亲就是个穷小子，没有多高的思想觉悟，一听有饭吃，就去找共产党了。”

回乡第3天，雷震就遇上了共产党领导的赤卫队。因刚从汉口回来，雷震一度被误抓。赤卫队查明其身份后，准备放他回家，没想到他坚决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。

雷震告诉赤卫队的人：“我已经没有家了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共产党。”就这样，他被留下当了交通员。同年8月，雷震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入党后，雷震逐渐明白，参加革命不只是单纯地打土豪、分田地，更是为了让和自己一样的劳苦大众摆脱贫困、争取解放而奋斗。1930年2月，雷震参加红军，后被编入红4军12师36团3营9连。

参加红军时，雷震已担任乡苏维埃的主席，组织原本打算让他直接担任连政治指导员，他却认为自己对部队还不熟悉，要求先当战士。不久后，他从副班长成长为连政治指导员。

尖刀连打到最后剩30多人

“我父亲一生打过不少硬仗，重伤3次。”雷立宪说。1932年，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期间，红四方面军第12师第36团奉命从麻城撤围，驰援黄安（今红安）。

8月11日清晨6时许，部队赶到黄安县城外，刚埋锅做饭，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得知敌军已向黄安进攻，紧急部署36团率第2、第3营立即出发阻击。第3营担任全团前卫，9连为尖刀连，走在最前面。

部队在黄安县城以西20余里的冯寿二丘陵地带与国民党军卫立煌第六纵队迎头遭遇。据雷震口述回忆录记载，敌军人数超千人，装备精良；红军每营不足300人，大部分战士使用旧式步枪，每人子弹3至5排，手榴弹3至4枚。敌我力量悬殊。

上午10时左右，战斗打响。敌军凭借炮火和机枪掩护，穿过稻田向红军阵地逼近。待敌人进入射程，红军突然开火，前排敌人成排倒下，后面的敌人又涌上来。弹药打光了，战士们索性跃出工事，抡起大刀、挺起刺刀，与敌人展开白刃战。

雷震生前回忆，战士们大喊“杀——嘿”，与敌人反复冲杀十余次。

雷震身负重伤，仍带领全连坚守阵地，并不断重申战场纪律：活不缴枪，死不丢尸，轻伤不下火线；干部负伤或牺牲，由下一级干部接替；如果干部全部倒下，就由战士自主报名代理。

激战至下午4时，36团已鏖战数小时，疲惫之际，1营赶到增援，全团发起反攻，敌军溃退。战斗结束时，雷震所在的9连，连同轻伤员在内仅剩30多人。

“父亲不怕牺牲，作战十分勇猛。”雷立宪说。正是这股猛劲，雷震在战火中不断成长。长征时期，他历任红9军第27师第79团政治委员、师参谋长。

牺牲的同志或站或坐，像活着一样

1935年1月22日，中共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向西线进攻，配合中央红军行动。雷震生前写道：“我们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，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。”

1935年3月28日，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，在四川苍溪等地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，由此踏上长征征程。1935年8月初，红一、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、右两路军北上。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，包括红9军、31军、33军。

“父亲生前说，长征途中的艰难困苦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要想甩掉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追兵，就必须走一条常人无法通过的险途——翻越高耸入云的大雪山，跋涉渺无人烟的草地。”雷立宪说。

然而，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格外曲折艰险，三过雪山草地，一路行军作战，付出了巨大牺牲。

“父亲生前不常向我们讲他的故事，但有次爬雪山的经历，他讲过很多次。”雷立宪说。

夹金山位于宝兴西北、懋功以南，海拔4000多米，常年积雪。当地藏民称大雪山为“神山”，认为除了神仙，连鸟也难以飞越。

雷震时任红9军第27师第79团政治委员。翻越前，藏民告诉了他三条规矩：要夜间通过，白天风雪大，难以翻越；途中不能大声喧哗，以免“惊动山神”；无论多累，人、马都不能停下来休息。

在战士们看来，这些说法带有迷信色彩。雷震认为，宁可信其有，也不能拿战士的生命冒险。他反复动员，要求全团严格遵守。第二天下午，部队开始登山。山风裹着雪花，寒气逼人。单薄的军衣难以抵挡严寒，越往山顶走，空气越稀薄，呼吸越发困难。有人头晕腿酸，一步一停；有人实在走不动，坐下来休息，便再也没有站起来。

“牺牲的同志，有的站着，有的坐着，在黑暗中看，仍像活着一样。”雷震写道。

天亮时，第79团终于登上山顶。劫后余生的战士们一阵兴奋，很快忘记了此前的约定，有人欢呼、唱歌，甚至朝天空鸣枪。

风雪骤然袭来。狂风裹挟着冰雹，部队顿时陷入险境。据雷震回忆，不到半小时，全团有三四十人伤亡。

“父亲后来才知道，这哪是什么惊动山神，是因为山高空气稀薄，气候瞬息万变。”雷立宪说。

经过3个多小时紧急转移，伤员和被困人员才转至山脚下一处草地。看着并肩作战的战友倒在雪地里，这位平日不轻易落泪的硬汉，放声痛哭。

“父亲从小生活在南方，哪懂得冻伤后不能立即烤火。”雷立宪说。

看到冻伤战士瑟瑟发抖，雷震心疼极了，立即让人砍来柴火，在伤员周围生火取暖。这一幕被刚下山的朱德总司令等人看到，雷震随后受到批评，还差点挨处分。朱德看到雷震双手有枪伤，又得知团长负伤就医，遂向他讲解冻伤救治方法，并要求妥善掩埋牺牲战士。

“直到晚年，父亲始终忘不了这次经历。每当提起，他既感念朱总司令的恩情，又满心愧疚，眼里泛着泪光。”雷立宪说。

回忆往事，心情沉重到吃不下饭

记者采访雷立宪的地方，正是雷震晚年居住的寓所。房屋1999年翻修过，走进一楼，正中挂着雷震夫妇的照片。雷震与李爱民在延安结婚，育有9个子女。

雷震不善言谈，话很少。关于自己走过的革命岁月，他很少向子女提起。今年82岁的长女雷延平住在合肥，雷立宪通过视频连线姐姐，谈及父亲的长征经历时，雷延平摇了摇头：“父亲生前很少讲这些事。有时候，我们看到他望着窗外叹气、发愣，就知道他可能又想起了那些往事。”

1982年，为留下革命史料，原武汉军区后勤部组织老红军口述革命经历，雷震听说后很配合。组织上让雷延平从合肥回武汉，为雷震记录。那年，雷震76岁。

雷立宪记得，每当讲到激动处，父亲就“满脸涨红”，不得不停下来休息。“每次口述完，他的心情都很沉重，饭也吃不下。”雷立宪回忆，父亲说：“身边的战友、领导都不在了，亲眼看着他们在战场上牺牲，一回想就很难受。”

这次口述前后用了两个多月，最终整理成18章、42页的文字记录。

1993年4月，雷震在武汉逝世，享年87岁。

遵照父亲遗愿，家人将部分骨灰撒在湖北黄陂木兰山。这里是他的家乡，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。

2017年，雷震的子女将父亲生前获得的一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，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

“我们相信，父亲的荣誉在那里，父亲的精神在那里，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魂也在那里。”雷延平说，“那里，是它们最好的归宿。”

记者张奕宁